

港大“中國經學”課程之退場

——一個東亞視域的考察

金培懿

提 要

本文立足於先行研究成果，進而從一個相對廣域的東亞視野來考察 1934 年以還，始於胡適，歷經陳受頤、容肇祖，完成於許地山的港大中文系改革事業之緣起原委、發展經過、造成之結果及其可能意涵。全文主要討論兩大議題，一是將港大中文系之改革，視為中國新文化思潮、文學革命之一環，重新分析胡適主持計劃改革港大中文系這一事業的性質為何？二是將港大中文系改革之兩大結果，亦即區分中國文史學系為“哲學”、“史學”、“文學”、“普通文學”四部，以及將“經學”自港大中文教育退場一事，置於東亞之近代新式大學課程如何編派舊學的發展脈絡中，以思考其間所展現出的共同樣態。本文以為港大中文教育之改革，其實並非只是一個大學內部單純的“課程”架構問題，我們應該將之納入民國初年以來胡適所從事的“文學革命”之一環來加以認識。又“經學”自港大中文完全退場，不僅是在英國人意想之外，也在中國內地“中文教學變動潮流”之外，筆者因此判斷胡適、許地山的港大中文學院改革發想源頭，恐在“域外”。而據本文考察我們得以合理推測：港大中國文史學系“中國經學”課程的退場，確實存在著隱而不宣的“日本因素”。

關鍵詞：香港大學 經學 胡適 許地山 日本漢學 東京帝國大學

一、引言

清末民初，隨著科學制度廢除、帝制被推翻、新式教育體制匆匆設立、學校教育體系分類初設，中國傳統主流學問——經學，邁入其前所未有的艱困處境。相對於此，香港經學卻在“倫敦會”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 - 1897）英譯四書、五經的基礎上，即使處於英國殖民政府大力推動英語精英教育的環境下，當時香港大多數學塾的教育內容，仍不外是傳授經學知識。就是最大官辦英文書院“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曾於1895年停辦該書院“漢文部”，1904年在考慮培養學生漢英翻譯能力時，除復設漢文教學之外，更增設漢文課程以教授學生研習《左傳》、《論語》、《孟子》等經書。而清末民初香港經學的發達，基本上是在香港華商與晚清遺老有意識地合力提倡，復加港英政府試圖利用尊孔、讀經以控制港人思想的算計下異軍突起。日後，隨著香港大學、學海書樓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相繼設立，經學發展更形蓬勃。¹

然而，隨著1927年魯迅蒞港演講，1935年元月胡適南遊香港，同年9月3日，許地山在胡適的推薦下赴港擔任港大中文學院主任教授，新文化思潮連續三波衝擊香港的影響之一，即是港大課目為之一新，結果就是“中國經學”自大學中文教學中退場。而歷來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不外將中國經學自港大中文教育的退場，歸因於胡適與許地山的“合力”傑作，以及晚清遺老

1 關於清末至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為止，香港經學的發展，較早可參閱羅香林：《第二章：香港早期之教會與理雅各、歐德理等之翻譯中國要籍》、《第六章：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載《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15—42；頁179—222。近年該方面之研究，代表性成果首推許振興教授之系列研究，如《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李景康與〈儒家學說提要〉的啓示》、《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兩種〈大學中文哲學課本〉的啓示》、《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1912至1941年間的發展》等，分別收入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2014年），冊5，頁495—518；頁521—553；頁555—595。本文有關此時期香港經學的背景知識與相關文獻，獲益於許先生之先行研究匪淺。

授經無方。² 然胡適、許地山所以會抱持此種改革港大偏重傳統經史之中文教育的思維，原因是否就只在彼等乃改革舊傳統、推動新文化運動之旗手而已？有鑒於魯迅、胡適、許地山等人皆有不同程度、不同形態的日本經驗，又日本乃東亞西式大學教育設置之先驅，故本文擬從東亞視野出發，探討由胡適、許地山所主持策劃的港大中文教育改革事業，其“中國經學”課程退場的時代背景中，“日本因素”存在的可能，以及東亞近代中文教育改革過程中呈現出的共相，以補充歷來對本議題之研究。

二、新文化思潮襲港與“有意”的中文教育改革

在 20 世紀 20 年代後期，隨著魯迅、胡適的相繼訪港，到許地山赴港擔任港大中文學院主任，民國初年以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潮，也隨之衝擊港地，³ 而胡適、許地山對港大中文教育的改革理想，車行健就主張：此乃新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環節。⁴ 而此一環節的文化思潮衝擊，就在大學之中文教育改革。而且此一大學中文教育改革，其實早在中國內地新文化運動波及香港前，便已見其端倪。因為英國威靈頓代表團（Willington Delegation）於 1926 年東來考察香港後所撰成之《特別委員會關於中文教學之報告》（Report of Special Committee

2 關於胡適、許地山與港大經學教育變革之始末原委，以及其間之關聯，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的變革》，收入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2014 年），冊 5，頁 597—611。剖析詳細，筆者多有參考借鏡。

3 胡從經以為 1927 年魯迅蒞港演講，與其日後發表的一系列香港新文化發展之文章，屬於第一波衝擊香港的新文化思潮。1935 年元月胡適南遊香港，與港大當局及當地士紳就港地教育、學術乃至社會文化的討論、批判與建議，則屬於第二波衝擊香港的新文化思潮。至於第三波衝擊則是 1935 年 9 月許地山正式上任港大中文學院，並將之改為“中國文史學系”。詳見胡從經：《新文化運動在香港迴響與勃興的實錄——讀陳君葆日記》，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書局，2004 年），卷 7，頁 603—611。關於此三波新思潮的衝擊，魯迅南來香港，為文撻伐港地保守勢力與英國殖民統治策略，詳見魯迅：《略談香港》，載《語絲》第 144 期（1927 年 8 月 13 日），收入《語絲 第一二一期至第一五六期（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年，頁 67—72。胡適南遊香港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詳見胡適：《南遊雜憶》，載《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冊 16，頁 197—205。至於許地山對香港的衝擊，則以改革港大中文系一事，最受重視。

4 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的變革》，頁 598。

appointed to advis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1926) 中, 早已指出: “本港大學, 應盡其所能, 以造就人才, 其中文課目, 雖不宜廢止經史, 但大學之中文教育, 不以造就中國舊式學者為鵠的, 而另有其現代意義。”⁵ 亦即, 港大中文教育所以有改革必要, 就在其“經史”教育只培養出“中國舊式學者”, 不具“現代”教育意義。中文科教師賴際熙面對危機, 遂不得不奔走四處, 設法解決危機, 終於在港地土紳與南洋華僑資助下, 於 1927 年擴大中文科以為中文系。然關於此一大學中文教育弊端, 港地土紳亦非不察。按胡適說法, 其於 1935 年 1 月 4 日抵港南遊所見, 周壽沈、羅旭龢等香港土紳也都熱衷港大中文教育之改革, 然此改革事業所以至其南遊香港時仍遲遲無法推動, 就在改革領導人才難覓。因為港人希望此一領導改革者必須同時俱備以下四種資格:

一、須是一位高明的國學家; 二、須能通曉英文, 能在大學會議席上為本系辯護; 三、須是一位有管理才幹的人; 四、最好是一位廣東籍的學者。⁶

我們由香港土紳上述所謂港大中文教育改革者必須兼具之四大資格, 可以間接窺知彼等認為: 經史等中文教育所以不彰, 就在無有“高明”之國學家, 就在無有“通曉英文”之國學家, 就在無有“管理才幹”之國學家, 故無法使經史教育發揮“現代”效用。而且, 設若有一既高明, 又曉英文, 更能管理之人才, 則此人才也應該要能通曉港地方言——廣東話。

按此一求才標準, 放眼當時港大中文系師資, 確實無人合格。因為自 1913 年開始便受聘於港大文學院的賴際熙與區大典兩先生, 至 1927 年港大中文系(又稱中文學院)成立, 賴、區二太史分別續任專任講師, 賴際熙兼系主任, 另有林棟為翻譯助理講師。三先生之外, 先後應聘為兼任講師者有溫肅、朱汝珍二

5 《一九二六年香港大學特別委員會關於中文教育之報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to advis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1926) 轉引自羅香林: 《第七章: 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 《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 頁 223。

6 胡適: 《南遊雜憶》, 頁 200。

太史,以及羅憩棠、崔伯樾二先生。1934年林棟逝世後,翻譯助理講師則由陳君葆先生繼任。⁷而無論是賴熙際、區大典,或是溫肅、朱汝珍,皆是光緒年間科舉出身之進士、榜眼、翰林士人,⁸其中雖然朱汝珍曾奉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但彼等絕非留學英美之通曉英文的高明國學家,但卻都是不折不扣的廣東籍“中國舊式學者”。情況至此,改革港大中文教育之策劃領導人,勢必得向外求其人才。亦即,在嫻熟廣東話之舊式學者與通曉英文且具管理才幹之高明國學家之間,港大勢必得做出選擇。

現實情況如此,港大當局遂主動前往中國內地尋求人才。1934年港大副校長韓耐兒(羅香林譯為韓惠和,William Hornell)與文學院院長佛斯脫(Dr. L. Forster)前往中國查訪,親自到北京訪尋主持改革中文系之適當人選。⁹同年5月18日,E. R. Hughes找上胡適洽談港大中文講師一事,胡適於是去信港大副校長韓惠和,並推薦了廣東出身的陳受頤與容肇祖二人前往港大考察,然後作改革港大中文教育之計劃。¹⁰同年6月4日,胡適再為港大中文學院之事,發了兩通電報,一通給港大副校長韓惠和,一通給容肇祖。不久陳受頤便與容肇祖南下香港,受邀至港大視察,研擬設計中文教學問題。¹¹而容、陳二人視察港大中文教育後的建議是:“港大中文部應保持其原有過去之計劃,教授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哲學。……今後應該注重用歷史與科學之見地研

7 詳參羅香林:《第七章: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229。

8 關於賴熙際、區大典、溫肅、朱汝珍之生平,詳參羅香林:《第七章: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245—248;以及鄧又同:《學海書樓主講翰人文抄》(香港:學海書樓,1991年),頁47—48;頁33;頁69;頁95。而黃偉豪則以此批清末廣東翰林學者,為南下香港鑿空、拓荒,奠定香港經學基礎的第一期南來學者,詳參黃偉豪:《香港南來學者的經學思想——以陳湛銓及其交遊圈為中心》,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2014年),冊5,頁465—611。

9 The University of H. K. Annual Report 1932—1933,頁22。轉引自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載《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13。

10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冊7,頁116—117。The University of H. K. Annual Report 1934—1938,頁44—45。轉引自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3。

11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冊7,頁123。

究經史。”¹²容肇祖與陳受頤二人此番結論，可以視為是代胡適之口而說出的，因為誠如本文後節所述，早在1923年元月，胡適於《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就已經不斷強調要以“通史”觀點以及採借美日具備科學性的“古典”研究方法。

由此看來，港大當局設想可以改革港大中文教育之擘劃者，顯然就是胡適本人，容肇祖與陳受頤二人的港大行，幕後推手即是胡適。此由1935年元月，胡適為接受港大所頒贈的法學名譽博士學位而南遊至港，亦可窺知港大當局的積極用意。而此次南遊，胡適對港大教育的觀察是：

這裏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裏，大陸上的中文教育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¹³

由此段遊記看來，筆者以為胡適不滿的，以及其深覺必須改革的，正是此種英人所辦大學中之中文教育，與“中國文史”之間的隔膜、港人過度忽視的“中文教學”，又“中國文字”竟然掌握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手中，以及置身於中國內地“中文教學變動潮流”之外的港大中文教育之“停滯不變動”現狀。通曉英文、非廣東籍、不以國學家自詡，卻能直達港大當局高層的胡適，關注的並非前述港地土紳的四大條件；而是誰來從事“中文教學”？“中文教學”究竟如何教授“中國文史”與“中國文字”？“中文教學”如何與時俱進？胡適思考的正是如何改革當時港大中文教育之“現狀”。

事實上，改革港大中文教育的策劃，早自1934年便開始，陳受頤與容肇祖的港大考察之行，即是其中一環。港大當局於1935年也希望聘請胡適南來港

12 《香港大學改組中文部昨日下午再正式召開會議》，《工商日報》，1935年10月16日，第3張第2版。轉引自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4。

13 胡適：《南遊雜憶》，頁199。

大主持中文學院，但遭胡適拒絕。港大同時也邀聘了陳受頤，陳亦同樣回絕。¹⁴但胡適則向港大推薦了許地山(1893—1941)與陸侃如(1903—1978)，而港大最終接受了許地山。許地山於1935年9月南赴港大擔任中文學院院長一事，誠如胡適自身所明言一般：“港大決定先請許地山去作中國文學系教授，將來再請陸侃如去合作。此事由我與陳受頤二人主持計劃，至今一年，始有此結果。”¹⁵關於胡適推薦許地山前往港大任中文系教授一事，並非秘密。¹⁶然而，許地山為何可以中選？盧瑋鑾以為：“恐怕通曉英文及留學英國，是他們聘請許地山主要原因。”¹⁷車行健則進而提出：許地山與胡適皆“參與新文化運動，以及幼時的臺灣生長經驗等相似背景，而得以為胡適所賞識”。¹⁸

筆者基本上贊成二人意見，然在此想要補充的是，我們亦不可忽略當時港地人士的穿針引線作用。蓋依據許夫人周俟松所述，許地山於1935年遭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排擠而自燕京大學離去後，適逢港大登報招聘中國文學教授，因為符合所謂留學英國與通曉英語、粵語、普通話等條件，故被採用而舉家南遷。¹⁹但依據繼林棟之後擔任翻譯助理講師的陳君葆日記所載，我們可以知道許地山在胡適推薦之前，應該有自投履歷在先，但卻無疾而終。此次申請

14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1935年5月2日條，頁141。

1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冊7，頁260。

16 《許地山先生生平事略》中載有：“民二十四，以胡適博士之荐，就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教授。”收入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許地山先生追悼會特刊》（香港：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1941年），頁2。

17 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4。

18 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的變革》，頁603。車教授此處所謂胡適與許地山“幼時的臺灣生長經驗”，筆者以為指的應是胡適於三歲左右的1893年4月8日，曾經隨母親前往其父胡傳在臺灣的任所，落腳於當時臺南“道署”，即今日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永福國小內，九個多月後的1894年1月20日，胡適纔又隨父母一行人轉赴臺東。至1895年2月7日胡適五歲時，因為甲午戰爭爆發，胡適便隨母親離開臺灣返回上海。而胡適來臺灣隔年的1894年2月4日，許地山誕生於臺灣臺南府城延平郡王祠附近的自家莊園窺園，即馬公廟許厝，即今日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895年末至1896年初許地山三歲左右，其隨二十多位家人由臺南安平港乘船逃離臺灣去到汕頭。亦即，胡適三歲到四歲時，許地山從出生到三歲時，他們皆曾居住過今日臺南中西區一帶，又他們皆曾在臺灣這塊土地生活約兩年時光。

19 周俟松：《許地山年表》，載劉紹銘編：《許地山作品選》（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頁217。

過程,許地山在港大的同學莫應嵩協助無效,但東木(亦即林棟)²⁰也有聘請許地山之意願。甚至日後即使有胡適推薦,正因有林棟以高明手腕安排在前,再加上陳君葆的推薦,似乎發揮了相當程度的效用,方能促成此樁美事。陳君葆在日記中如下寫道:

校長賀納問我知道許地山、陸侃如兩人否,我據實以對。他又問一個甚麼 Mo Chien,我想不出是誰,似乎這人不大出色。據我的意見,若果陳受頤不能來,能得許地山則更佳,從前東木也說過,有請許地山的意思,但不知怎樣又復擱起來了。我不解憩棠何以說是東木的手腕。²¹

十點開科務會議,討論依據校董事會議意思決定改聘許地山擔任中文學院院長事,羅伯辛教授說明了我的意見,對於許地山的學問資格及在中國學術界的地位說了一番後,於是大眾遂一致通過胡適的建議。²²

遇見國芬談起許地山來,說好些時以前許原自投函來的,並有莫幹生從中爲之先容,但不知怎的,賀耐竟把事擱置起來!現在聞聘了許地山,他覺得異常滿意。這一件事原來頗有點來歷,怪的憩棠曾力稱許東木的手腕。鳳坡今晨寫了一封信來囑許來後介紹相見,原來國芳早已和他說過,莫應嵩和許地山原是同學。²³

20 《陳君葆日記》中所謂:“從前東木”云云,東木此人,所指應爲林棟。蓋陳君葆此處所謂的“從前”指的應該是許地山首次自投履歷應徵時,而待至1935年胡適推薦許地山時,林棟於前一年的1934年5月14日,意外死於西環煤氣鼓大爆炸事件中。林棟,原名林朝棟,字世權,號東木。原籍廣東新會,中學在香港聖士提反書院就讀,後進入港大文學院,成爲第一屆畢業生,並以經學95分和史學100分的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詳參賴際熙:《荔坵文存》,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臺中:文聽閣圖書,2008年),冊59,頁60。而林棟畢業後曾任星洲中文視學官,港大中文系成立後,應邀擔任中文系翻譯講師。有關林棟生平詳參李景康:《香港大學講師林棟君墓誌銘》,收入李鳳坡先生詩文集籌印委員會編:《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李鳳坡先生詩文集籌印委員會,1963年)。

21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1935年5月9日條,頁142—143。

22 同上,1935年6月8日條,頁148。

23 同上,1935年8月8日條,頁156。

一般以為許地山南來港大，乃由胡適推薦而成事，然由上引陳君葆的日記看來，許地山在胡適推薦之前已然自行投過申請函，日後當胡適同時推薦他以及陸侃如二人給港大當局時，正因為港地有許地山的同學舊識，特別是莫應嵩、林棟想方設法為其周旋，以及陳君葆持平向港大當局說明其學歷資格並肯定其在中國學界之地位，校長賀納以及校董會終於纔通過聘請許地山。故胡適所謂的：“此事由我與陳受頤二人主持計劃。”其實只說出了港大聘請許地山的表面原因，至於港大內部的人事聘任運作則有賴許地山舊識以及陳君葆等愛才之士。這或恐也是胡適雖推薦了許地山與陸侃如，但港大卻選擇了許地山的原因之一。

陳君葆的日記又記載說：“芬匿顏對我說，關於許地山之來覺得非常滿意，並謂將寫信給金文泰使他歡喜。”²⁴許地山來港大，對香港殖民當局而言，則終於盼來一位留學英美的現代學人。筆者以為這除了是因為許地山嫻熟英語、廣東話、普通話，以及與胡適的相似背景外，許地山的學術專業領域，或許也發揮了一定功用。因為其研究宗教學、印度學與精通梵文等特點，恰與香港大學創辦者愛里鸚爵士(Sir Charles Eliot)有著高度相似性。胡適南遊香港時，針對港大與港地士紳所提出的，所謂主持港大中文教育者必須具備四種資格一事，就懷想起港大創始人愛里鸚爵士。胡適說：

此君是一位博學的學者，精通梵文和巴利(Pali)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鉅冊；晚年曾任駐日本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佛教，想著一部專書。書稿未成，他因重病回國，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從美國回來，過日本奈良，曾在旅館見著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lvan Levi)，瑞士(現改法國籍)的戴彌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可稱盛會。……愛里鸚校長是最初推薦鋼和泰先生(Baron Stael-Holstein)給北京大學的人。……可惜愛里鸚以後，

24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1935年8月19日條，頁157。

這樣的學術上的交通就不曾繼續了。²⁵

胡適或恐是在許地山身上懷想起當年故人愛里鶚，所以也推薦一位“類鋼和泰”回報港大，投桃報李，都是一樁學術交流美事。只是胡適這次是反向的中國學術人才派任港大，希望其能在港大落地、育才、生根。惟不知港大當局以及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K. C. M. G.)，是否也在許地山身上，見著昔日港大校長愛里鶚以及鋼和泰的身影？然總而言之，胡適對港大中文教育改革的主持計劃，乃至改革推動者之薦舉，確實屬胡適個人之“有意”作為。此就如同其主張“有意的白話文學”、“有意的國語主張”與“有意的文學革命”，強調的是一種“速度”與“經濟性”。胡適強調晚近的白話小說史與千年來的白話文學一樣，有著莫大的缺點就是：“白話的採用仍舊是無意的，隨便的，並不是有意的。民國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便是一種有意的主張。無意的演進，是很慢的，是不經濟的。”²⁶

而正是此種“有意”的革命計劃，諸如與港大當局積極往來、商請容肇祖與陳受頤先至港大考察，再推薦許地山、陸侃如給港大，堪稱在一年內以節奏明快的“速度”推進港大中文學院之改革。同時又因自覺地區隔彼我與新舊，當胡適所推薦的許地山被港大聘任為中文學院院長後，胡適來港南遊時目睹港大彼種：英人所辦大學中之中文教育，與“中國文史”之間的隔膜、港人過度忽視的“中文教學”，又“中國文字”竟然掌握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手中等亟待改革的問題點，終於因著許地山的赴任，使得愛里鶚、鋼和泰以後中斷的中、港學術交通，於是得以再次連結。而港人與英人未能正視的“中文教學”問題，則交回中國人手中處理。至於幾個舊式科第文人，如羅憩棠便已在許地山上任前自覺工作不保。實際情況則是在許地山到任的1935年年底，歷史講師羅憩棠舉人與國文講師崔伯樾秀才，港大校方不再續聘；²⁷經學講師區大典太史則於

25 胡適：《南遊雜憶》，頁200。

26 詳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2，頁262。

27 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6。

1937年退休。²⁸ 1936年3月，許地山捨棄當年胡適設想日後可以南來港大與許地山合作改革事業的陸侃如，意屬同樣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且是其燕京大學舊同僚的馬鑑，聘其為全職講師。²⁹ 如此一來，短短一年半左右，港大中文學院從此再不復見所謂舊式科第文人。

值此之際，1935年元月，胡適所謂：置身於中國內地“中文教學變動潮流”之外的港大中文教育之“停滯不變動”現狀，已然非常具有“經濟性”地展開其變動改革作為。而最大的變動莫大於改易中文學院為“中國文史學系”，³⁰ 以及將該系分為：“普通文學部”、“文學部”、“歷史部”、“哲學部”四部。³¹ 從此：“把‘讀經’派全部剔除……香港大學中文系包括了文、史、哲、翻譯四項課程，也成了定局。”³² 換言之，港大中文系改革的最大成果，即是“經學”的退場。而筆者以為此一結果，堪稱是胡適“打鬼”、“捉妖”的結果。蓋對胡適而言，白話乃政治性的、哲學性的、歷史批判性的語言；而哲學指的是“社會與政治的革新”，³³ 意味著“反動”歷來事物的“革命”，具有政治革新與批判歷史的意義。亦即，胡適並非單純地追求文言一致或是新文學，而是在追求一種能夠達成“打鬼”作為的，所謂政治性的、哲學性的、歷史批判性的語言。胡適主動參與港大中文教育的改革，正是其“有意”的白話運動之一環，而港大“讀經”派舊式科第文人的

28 依據《華僑日報》1935年10月14日報道：“港大中文部之目下情形，係由許地山任教授……區、羅、崔、陳各講師將於本學期末滿職，屆時各講師留任與否，將有多少變動。”載單周堯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7年），頁44。然根據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兩種〈大學中文哲學課本〉的啓示》之考察，區大典應該是在1937年1月正式自港大中文系退休（頁526）。

29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1935年10月1日條，頁166。

30 《港大漢文學院或將改為中國文史系，許地山教授就職後將有新猷》，《工商日報》（1935年9月9日），三張一版。轉引自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5。陳君葆提及當天晚上許地山在華僑教育會的演說，許地山顧及陳君葆在系務會議中提出“如何擴大中文系作用”之建議，故而在演講時主張“國學”應包涵醫術、占卜、星相等國術。詳參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1935年9月10日條，頁159。

31 《華僑日報》（1935年10月14日），載單周堯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頁44。

32 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6。

33 胡適：《先秦名學史》，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5，頁34。

剔除,以及“經學”科目的退場,則是胡適與許地山“打鬼”、“捉妖”的結果。

然則,彼等分中文系為“普通文學部”、“文學部”、“歷史部”、“哲學部”四部的此一“打鬼”、“捉妖”發想,又是從何而來?事實真如盧瑋鑾所說,就是英國人心目中的“漢學”模式嗎?³⁴

三、“經學”之退場：東亞近代中文教育改革共相

誠如前述,胡適遊港時以為港大中文教育亟待改革的現況之一,就是其仍置身於中國內地“中文教學變動潮流”之外。但是就許地山改革中文系為“普通文學部”、“文學部”、“歷史部”、“哲學部”四部,並從課目與課程中完全剔除“經學”、“經書”一事看來,此種改革模式顯然並非早先中國內地已然發生的中文教學變動結果。因為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教育部針對全國大學各院系必修及選修課程進行整理,進而起草審查大學各院系科目,其中文學院分系科目,係由中國文學系朱自清、外國語文學系朱光潛、哲學系馮友蘭、歷史學系朱希祖起草審查,而當時中國文學系可以分設“文學”及“語言”兩組,或是不分組,兩組之必修、選修科目不同。³⁵

而不分組之中國文學系或是文學組,其課程科目中雖然早已無“經學史”或“經學通論”等課程,³⁶但必修科目中的“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一)”之備注欄,

34 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114。

35 詳參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局，1940年），頁1—16。

36 依據錢穆先生的說法，在民國十九年以前，北平各大學皆開設有“經學史”、“經學通論”等課程，但自從其於1930年6月刊載於《燕京學報》第7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問世後，學界因為意識到經學不能再按照康有為那麼講，從此大學內沒人再開這類課，復加日本侵華，無人有心想此專門之學，經學課一停開，竟因循數十年未能恢復。詳參錢穆：《師友雜憶》，載《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冊51，頁163，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說明》，載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但根據車行健：《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頁131—159之研究，事實並非如此，民國十九年以還，無論是北平或是廣州、武昌、昆明等地的大學講堂上，“通論”、“概論”、“通史”類之經學課程並未絕跡，“經學”課目的消失，基本上是在1938年以還，國民政府教育部所主導的大學院系課程整理修訂工作啟動後。由此亦可一定程度證明港大在1935年開始展開的中文教育改革中，“經學”課目的退場，確實與中國內地無關。

則明記著“群經諸子”，必須在第三學年修習四到六個學分。而且必、選修科目也相對多樣，“中國文學史”為必修，另有“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二）”則是四史與《晉書》，亦為必修，另有“中國近世史”為選修，又“中國哲學史”亦為選修。³⁷亦即，中國內地大學院校之中文系，絕非四分為“普通文學部”、“文學部”、“歷史部”、“哲學部”四部，“群經”也仍在課目之中，且所佔學分數亦不低。

即使是許地山曾任教過的燕京大學，1941年時國文學系的課程中，“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一）（二）”的授課內容，則仍有《尚書》、《三禮》、《春秋三傳》、《周易》、《論語》、《孟子》、《詩經》。³⁸由1938年審訂的“大學科目表”中，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必修與選修科目之設置安排，與港大改異後的中國文史學系之分科科目設計有異看來，胡適與陳受頤主持計劃一年，到許地山終於赴港大主持中文學院進行教學改革，我們可以說胡、許之改革港大中文教育之理念原型，顯然不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或是燕京大學。換言之，彼等有意地剔除“經學”、“經書”的“打鬼”事業發想源頭，恐怕是在“中國”之外的“漢學”世界。

關於此一問題，且讓我們先來看看胡適對“經學”所抱持的態度。1923年元月，胡適於《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的發刊宣言中，針對清朝古學指出三大缺點，而就第一個缺點“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一事，胡適如下說道：

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裡，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

37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頁35—40。

38 詳見燕京大學：《燕京大學課程一覽》（北京：燕京大學，1941年），頁30—31。

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³⁹

而就第二個缺點“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一事，胡適如下批判道：

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地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⁴⁰

再就第三個缺點“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一事，胡適如下總結道：

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裡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採，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⁴¹

按胡適的說法，國學之“陋”，就在學者們傾其全力只研究幾部“經書”，而不發展其他。而偏偏彼等傾力用功的“經學”卻又不與社會發生關聯，產生不了社會影響，故只能在幾部“經書”中兜圈子，結果越形鄙陋。而且在胡適看來，此種為學之“陋”的遺害，就在革命也改不了的思想體質。⁴²

1935年1月9日，胡適南遊香港後轉往廣州，其時廣東當局正在倡導“讀

39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載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頁3—4。

40 同上，頁4—5。

41 同上，頁6。

42 胡適於《獨立評論》98號的編輯後記中說：“近來提倡國醫國拳，反對考古發掘，提倡讀《孝經》，提倡扶輪法會……的先生們，在二十年前何嘗不是最新的革命黨？今日許多開倒車的舉動，根本原因只在一個‘陋’字，只在不能認清這個新鮮世界所能貢獻給我們的神奇法術。”載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冊4，頁1219。

經”政策，主其事者為廣東省總司令陳濟棠。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的演說已經公然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此次遊訪廣州，更會晤陳濟棠本人，針對陳濟棠所謂“生產建設”之本在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但“做人”之本則必須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的“讀經祀孔”理論，胡適反駁道：

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我並不反對古經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們假借經典來做復古運動。這回我在中山大學大演講題目本來是兩天都講“儒與孔子”，這也是古經典的一種研究。……第二題何不就改作“怎樣讀經”，我可以同這裏的少年人談談怎樣研究古經典的方法。⁴³

對小學“讀經問題”的爭論，晚清以來即有之，⁴⁴然而胡適反對“讀經”此種學習老路數，就在反對“復古”地在幾本經書兜圈子的讀書法，因為此種讀經作為只會使人“陋”於現實社會，故說“做人”也得非科學知識不可。既然如此，胡適當然不認為學校教育中還需要有經學存在。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針對傅孟真在前一天於《大公報》上發表“星期論文”以討論學校讀經問題時，提出所謂：“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於拿些教師自己半懂不懂的東西給學生——六經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⁴⁵胡適遂於《獨立評論》第 146 號發表《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一文，除了將傅孟真文中最精確的一段轉載於該號《獨立評論》，胡適更如下說道：

今日提倡讀經的人們，夢裏也沒有想到五經至今還只是一半懂得一半

43 胡適：《南遊雜憶》，頁 208—209。

44 詳參胡曉明編：《讀經：啓蒙還是蒙昧？——來自民間的聲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梁皇儀：《晚清迄民國前期讀經問題之探討》，收入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 5，頁 69—92。

45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 4，頁 1354。

懂不得的東西。這也難怪。毛公、鄭玄以下，說《詩》的人誰肯說《詩》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韓康伯以下，說《易》的人誰肯說《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談，三百年中的經學家，陳奐、胡承珙、馬瑞辰等人的“毛詩學”，王鳴盛、孫星衍、段玉裁、江聲、皮錫瑞、王先謙諸人的“尚書學”，焦循、江藩、張惠言諸人的“易學”，又何嘗肯老實承認這些古經他們只懂得一半？所以說孟真先生說的“《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東西”，這句話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極少數專門家的見解，只是那極少數的“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的見解。這種見解，不但陳濟棠、何鍵諸公不曾夢見，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所以我們在今日正應該教育一般提倡讀經的人們，教他們明白這一點。這種見解可以說是最新的經學，最新的治經方法。……古代的經典，今日在開始受科學的整理時期……最近一二十年中，學校廢止了讀經的功課，使得經書的講授完全脫離了村學究的胡說，漸漸歸到專門學者的手裏，這是使經學走上科學的路的最重要的條件。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⁴⁶

顯然，胡適不僅反對兒童讀經，他所以積極地要與青年學子談研究古代經典的方法，屢屢強調要使經學走上科學的道路，就是因為不相信舊式科第文人的那套經學研究方法，不認為歷來的大經學家們真懂得古經典之內容，⁴⁷而此種認知來自其對傳統經學“研究方法”之有效性的懷疑。所以胡適提出研究古學的三個要點：一擴大研究的範圍；二注意系統的整理；三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⁴⁸ 其中第一、第二要點方面，中國歷來已有前例可循，但胡適針對第二個要

46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4，頁1355—1359。

47 胡適此一認知還與他所認為是學問最博、方法最縝密的“大師”——王國維的自我告白有關。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言：“以弟之愚闇，於《書》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收入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卷2，頁75。

48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頁54。

點，則特別提出理想的國學研究，要有一個“通史”的系統，故提倡要有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等。並強調專史之中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強調這種子目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⁴⁹

另針對第三要點，胡適指出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之“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甚至以“附會”代替“比較”。因此建議現在治國學要打破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主張在“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學術界，中國學者應該虛心採用其科學方法，補救自身治學沒有“條理系統”的弊病。又在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成績可供參考比較，可以給中國學者開無數“新法門”，可以添無數“借鑑的鏡子”。⁵⁰ 胡適顯然試圖藉由參考借鑑日本已然“近代化”的漢學——“東洋學”、“支那學”的研究方法，以改良中國歷來的古學/經學研究，其中特別是有關“通史”的撰作，以及採借西方為學法的科學性“古典”研究。胡適曾說：

我是一個最讚嘆日本國民已往成績的人。我曾想象日本的前途，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她的勤儉愛國的人民，她的武士道的遺風，她的愛美的風氣普遍，她的好學不厭的精神，可以說是兼有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民族的優點，應該可以和平發展成一個東亞的最可令人愛美的國家。⁵¹

這是 1935 年許地山赴港後一個月，10 月 3 日，該年雙十節前一週，胡適應日人室伏高信先生之邀所撰寫的，擬刊登於該年十一月號《日本評論》（原名《經濟往來》），名為《敬告日本國民》一文中的胡適的心聲。亦即，即使在對日本侵華提出嚴正警告，胡適仍不否認日本的美好及其令人值得學習與欽羨的部分。而筆者以為此種主張向日本學術研究取法的思維，基本上也一定程度反映在

49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頁 57—58。

50 同上，頁 59。

51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 4，頁 1422。

其對大學中文系的分科發想上。

蓋胡適、蔡元培等人的大學理念有異，北京大學基本上是採取德國制的大學設置理念，⁵²而胡適主張所以必須設置近代大學的理由之一，即在如果中國不設置近代大學，則結果將是：“全國乃無地可習吾國高等文學。”⁵³換言之，欲學習自國之高等文學，必須到大學學院內來學習。亦即，即使採取西方綜合大學之制度與教育，大學在中國仍需擔負起傳承教授傳統學問的責任。胡適所謂此一大學須要“從事本國高等文學”的主張，其實指的就是“中文系”的義務，而此一主張恰與日本當局在開辦東京大學文學部時，所以要加設“和漢文學科”的理由乃在於所謂“感慨斯文殆墜於地”的考量一致。⁵⁴但是，大學內的中文教育，設若仍舊不脫義理考據，仍為舊式科第文人所把持，那絕非胡適所樂見。

早在南遊香港前，胡適便對大學如何培養一個國家社會的領導人才一事，發出無盡慨嘆：

五千年的中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八股試帖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做書院課卷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當日最高的教育——理學與經學考據——也是不能造領袖人才的。現在這些東西都快成了歷史陳跡了。⁵⁵

胡適發出此番感慨是在1932年，而1932年距離北京大學創辦的1912年，確實不到30年；但胡適口中的“三十年的大學”，具體指的又是何所大學呢？哪所30年以上的大學是胡適藉以為中國大學之前導模範的大學呢？筆者以為胡適此話背後的意指，就在1897年東京大學改制為“東京帝國大學”，同時還指向也在該年設置的“京都帝國大學”。而無論是改制後的東京帝國大學，或是

52 詳參左玉河：《第四章：從傳統書院到現代大學：現代學術研究中心之奠定》，《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51—299。

53 胡適：《非留學篇》，收入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教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8。

54 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冊（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32年），頁468。

55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3，頁1078。

1897年設立的京都帝國大學，在胡適沉痛感慨中國當時無一所30年之大學的1932年，都已設置滿35年。由此看來，胡適始終意識到日本大學教育的超前中國，同時也關注日本學界的學術研究發展。

那麼，且先讓我們來看看日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分科編設是何情形。明治十年(1877)東京大學成立後，文學部第一科為史學、哲學與政治學，修習時間四年；第二科為和漢文學，修習時間三年。無論第一科或第二科皆需修習英國文學，而第一科的學生於前兩年內尚須兼修法語或德語，第二科的學生第三年還得兼修歐美史學或哲學。而歐美史學是兩科學生都必須兼修的課目，國史(日本史)與支那史(中國史)則包攝於“和漢文學”題下，至於所謂的“哲學”則專指西洋哲學、西洋哲學史、心理學等，完全無關乎“東洋哲學”。此種課程安排，凸顯了在歐化風氣盛行的明治十年代，一切以歐美歷史、哲學與外語學習為重的教育傾向。其實，東京大學設立後一直以英語授課，要到明治十六年(1883)四月纔開始以日語授課。當時文學部第一科自第一年至第三年，皆有“和文學”與“漢文學”的課目，第二年至第四年則有“哲學”課目；第二科則是自第一年至第三年，皆有“和文學”與“漢文學”的課目，“歐美史學”與“哲學”則三年間每年可擇一選修。這樣的課程結構，顯然沒有“經學”一科。⁵⁶

明治十二年(1879)，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科課程異動，原有第二科的“和漢文學”科，改為“和文學”科與“漢文學”科；第一科的哲學、歷史、政治改為“哲學”、“政治學”及“理財學”科。第一科第一年至第四年皆有“漢文學及作文”與“史學”課目，第一年至第三年皆有“和文學”課目，第二年至第四年皆有“哲學”課目。第二科第一年至第四年皆有“漢文學及作文”課目，第一年的“和文學”課目，自第二年開始到第四年則改為“和文學及作文”，又第一年的“英文學及作文”一課，自第二年開始改為“英文學”或“史學”或“哲學”。可見此次改制結果，除了將和漢文學科區分為二並延長修習期間為四年之外，顯然無論是

56 詳參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冊，《第二篇學部·第四章文學部》，頁685—690。

和文、英文或漢文，皆非常強調“作文”一事。⁵⁷

明治十四年(1881)文學部再行學科組織改制，分爲第一科哲學科；第二科政治學及理財學科；第三科和漢文學科。各學科第一年修習課目相同，第一科與第二科自第一年至第三年皆有“漢文學及作文”；第二科則是四年間皆要修習“漢文學及作文”，第一年的“和文學”課目，自第二年開始到第四年則改爲“和文學及作文”，第一年至第三年必須修習“史學”，第二年至第四年則要修習“哲學”。也就是說，此次課程改制，和漢文科，首先還是最看重漢文、和文的“作文”能力，其次則是“史學”與“哲學”的分量日趨重要。⁵⁸

翌年明治十五年(1882)九月及十二月兩次改訂學科課程時，將第一科哲學科與第三科和漢文學科從第二年至第四年中的“哲學”課目，改爲“西洋哲學”，並增設“東洋哲學”一課。此時和漢文學科同樣四年間皆必須修習“漢文學及作文”，第一年的“和文學”課目，自第二年開始到第四年則改爲“和文學及作文”。而原本第一年至第三年必須修習“史學”，改爲只需第一、第二年修習，但原本第二年至第四年得修習的“哲學”課目，則改爲第二年至第四年皆須修習“西洋哲學”與“東洋哲學”。換言之，此次改制的結果，“史學”削弱，但“哲學”更形加重。⁵⁹

明治十七年(1884)十二月九日，東京大學總理加藤弘之有鑒於前一年開辦“古典講習科”招生，爲使得“和漢文學科”的學生所學更爲精進，遂向文部省提出文學部改正案，擬自修習的第二年開始，分“和漢文學科”爲“和文學科”與“漢文學科”，明治十八年(1885)二月五日獲准改制。在加藤弘之顧慮所謂：“雖有和漢文學之名，其實不能充分教導和漢之學勢不可免。”⁶⁰的這一考量下，不僅和文學科的學生第一年也必須修習“經學”；漢文學科的學生更是從第一年至第四年皆必須修習“經學”與“漢文學”，“經學”首次登上了大學的課

57 此次改制經過詳參《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冊，《第二篇學部·第四章文學部》，頁690—696。

58 同上，頁696—702。

59 同上，頁702—708。

60 同上，頁709。

堂，獨立成爲一科課目，並與“漢文學”平起平坐。而“史學”也前所未有地必須四年皆修，又“詩文”乃是自第二年至第四年必須修習的新課目，取代了之前的“作文”。至於“西洋哲學”與“東洋哲學”則稍微限縮成自第二年開始修習至第四年；而第三年與第四年的課程中還新加入了“諸子”一課。從結果而論，我們可以說：漢文學科的課程結構一定程度回復了經、史、子、集的架構，然“經學”的出現顯然擠壓了“哲學”課程的空間。⁶¹ 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十五日，文部省下令移“政治學及理財學科”於法學部，文學部遂成爲哲學科、和文學科、漢文學科三科所構成。⁶²

漢文學科課程中“經學”課目的出現，與課程結構一定程度回復了經、史、子、集架構一事，基本上可以視爲“古典講習科”設置後的效應。因爲明治十六年（1883）開始招生的“古典講習科乙部”，其修課規則共分八期，課目如下：

第一期：經學、史學、諸子、詩文。

第二期：經學、史學、諸子、詩文。

第三期：經學、史學、法制、詩文。

第四期：經學、史學、諸子、詩文。

第五期：經學、史學、詩文。

第六期：經學、史學、詩文。

第七期：經學、史學、諸子、法制、詩文。

第八期：經學、史學、諸子、法制、詩文、卒業論文。⁶³

誠如町田先生所言，“古典講習科乙部”學生，修習課目係以經史子集四部與法制爲主，講授方式則是教授的漢籍講讀，以及學生們輪流擔當解讀，由師生共同討論的“輪讀”。至於漢文作文則須每月撰寫一篇。但即使課目表面看來是朝傳統漢學“復古”，但真實的情況卻是：

61 《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冊，頁 708—714。

62 同上，頁 714。

63 同上，頁 734—735。

授業解惑的方式與歷來漢學則“左國史漢”，詩文則“漢詩文”，此種以道德修養論為極致的宗旨大異其趣。換言之，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的教學宗旨是以“近代的學問、教育”為其目標。史學家重野成齋所謂的“學問即考證學”也與此一宗旨相近。⁶⁴

也就是說，即使“經學”回到了大學課堂上，其追求的近代轉型目標，乃在客觀實證的知識型研究，而非探索經書中的“聖人之教”，更不會是歷來的主流經書研究法——注經。亦即，“經學”即使重返課堂上，其已然非舊時“經學”。此點我們由兩年後的明治十九年(1886)，東京大學改制為帝國大學，文學部改制為“文科大學”，漢文學科回復三年制，雖然規定自第一年至第三年皆須修習“支那經學”一課，卻立刻在翌年的明治二十年(1887)九月九日，文科大學增設“史學科”、“英文學科”、“德文學科”三科時，漢文學科的“支那經學”課目隨即消失，而“漢文學”、“支那古文學”、“支那歷史”課目則仍維持各學年皆有，就是哲學課目也以“哲學史及論理學”、“哲學史及心理學”、“東洋哲學”等三個課目，也被安排於各學年課程架構中看來，“經學”於明治十六年至明治十九年的四年之間，短暫出現在東京大學、帝國大學“漢文學科”課目中一事，宛若迴光返照。

明治二十一年(1888)以還，文科大學各學科課目屢經改廢，但可確定的是：日本自國主體意識日漸高漲，證據之一即是伴隨著“編年史編纂掛”被設置於文科大學中，“國史學科”也在當年十月設立。日後，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雖陸續於明治二十二年(1889)，改和文學科為“國文學科”，改“漢文學科”為“漢學科”；乃至明治二十四年(1891)、二十五年(1892)、二十六年(1893)相繼改正授業課目或各課目之授業時間，“經學”宛若成了一位被棄老人，從此未能重回學校教育的大學課堂。即使明治二十六年九月，文部省所頒布的第93號敕令

64 町田三郎：《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の人々》，《明治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頁135。而島田重禮的考證學，主要是以講授清朝考證學為主，當時其講授《詩經》即依據中國最新出版的研究叢書《皇清經解續編》，以指導學生進行實證的研究，詳參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東京：講談社，1976年），《狩野直喜》，頁176。

中，帝國大學始設“講座”制，然文科大學的講座依然未見“經學”講座。此事由以“三會箋”（《論語會箋》、《左傳會箋》、《毛詩會箋》）聞名中日學界的竹添光鴻身上，亦可獲得印證。明治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竹添光鴻任職帝國大學，擔任漢學、支那語學第二講座教授，但卻無法教授其擅長的“經學”，而是教授“支那史”。明治二十八年（1895）九月二十六日竹添光鴻退官卸職，翌年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月二十七日由根本通明繼任漢學、支那語學第二講座教授，而根本通明於大學講臺上也只是講授《論語》等事看來，皆一定程度證實“舊”經學已然消失於近代的日本大學課堂。

蓋自明治二十年代以還，近代日本《論語》研究的專著，主流已不再是伏案提筆的“注”經作業，而是面對教室中眼前的學子，是以“人”為對象的“講”經作業。⁶⁵ 年長竹添 20 歲，為其東京帝國大學之同僚的根本通明（1822—1906），早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便有《論語講義》問世；竹添之摯友，同時也是東京大學時期“漢文科”教授的三島中洲（1830—1919）亦長竹添 12 歲，其所撰《論語講義》則於大正六年（1917）一月印行出版。事實上，由三島中洲之《論語講義》自大正六年（1917）一月印行問世以來，歷時不到半年，到同年四月便已四度印刷發行看來，可謂廣受讀者歡迎。而竹添《論語會箋》一書，卻只於昭和九年（1934）被收錄進《崇文叢書》第 2 輯（東京：崇文院）印行問世，爾後未曾在日本國內重印或再版，僅臺北廣文書局於昭和三十六年（1961）十二月，翻印《崇文叢書》版《論語會箋》，故未能在日本流傳開來。⁶⁶

由上述之說明可以得知：若從明治二十年代中後期以還，大量出現的《論語講義》專著來看，顯然日本的《論語》研究已產生“近代化”現象，其凸顯出的意義是：《論語》作為日本的古典之一，該以何種型態於新式教育體制下的課堂中呈現，以作為授課的科目之一，此乃是一嶄新的《論語》研究課題，而這正也

65 據筆者調查，明治中期以還至終戰為止，以“論語講義”為名出版問世的《論語》解說書，多達 63 種。詳參金培懿：《近代日本〈論語〉研究之轉折——安井小太郎〈論語講義〉析論》，《國文學報》，2006 年第 40 期，頁 19—73。

66 關於竹添光鴻《論語會箋》問題，詳參金培懿：《復原與發明——竹添光鴻〈論語會箋〉之注經途徑兼論其於日本漢學發展史上之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7 年第 30 期，頁 307—353。

是“經學”作為漢文學課目時必須面臨的轉型問題。由此看來，竹添似乎是在“新”《論語》研究之潮流外的，因此《論語會箋》之問世，可以說是當時日本《論語》研究之異例。

另外吾人亦可推知：在日本明治開化、維新後近 20 年的近代日本社會中，“漢學”、“漢文學”乃至“經學”，其作為一門大學教育中的學科之一，無論是在學科本身的研究方法、研究觀點、研究課題，乃至教授“漢學”、“漢文學”、“經學”的教師本身之教學方法與教師體質等各方面，皆有待“開化”與“革新”。故即便時人將竹添光鴻、重野成齋、川田甕江、三島毅等人並稱為“明治文豪”⁶⁷；中村忠行更指出時人稱讚竹添與島田重禮乃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漢學科之“雙璧”⁶⁸，但受教於竹添的笹川種郎卻對其持否定態度，笹川說道：

竹添井井先生之支那史，實在無趣，一手持鐵扇的根本通明先生之《論語》，吾則敬而遠之而未聽課，漢學全聽島田先生。⁶⁹

笹川的評價或許反映出竹添在任教授課上的不適任。單純來講，或許是因其學問缺乏新氣息，但由此亦可看出當時社會與校園對竹添的評價兩者之間存在的落差。

按笹川種郎的說法，擅長舊漢學/經學的竹添光鴻與根本通明二人在大學講臺上的表現，前者無趣，後者則是引不起其學習興趣，“漢學講座”課程中，笹川聽講的幾乎都是詩文與考證皆擅長的島田重禮的課。針對此點我們不妨思考一下，明治三年(1870)出生，當時就讀帝國大學的笹川種郎，正是明治漢文科教科書所培養出的新生代種子漢學家，而其“教學評價”雖相當程度反映出

67 參見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頁555。

68 詳參岡本黃石等著，神田喜一郎編：《略歷》，載《明治文學全集 62·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年)，頁410。

69 笹川種郎：《明治還魂紙》，收入白井吉見編：《明治文學全集 99·明治文學回顧錄集(二)》(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頁140。

竹添光鴻、根本通明兩位“天保老人”⁷⁰無法適應近代大學新式授課問題。附帶一提的是，與竹添光鴻、根本通明相較之下，從日後三島中洲《論語講義》出版後廣受歡迎一事看來，帝國大學命其擔任第三講座之教授以教授作文，確實是適才適所的安排。

另外，笹川種郎對大學講堂上竹添光鴻等天保老人這類日本舊式文人之“經書”課程的興趣缺缺，宛若日後港大中文學院學生對區大典經學授業的負面反應。依據陳君葆的日記所載，面對區大典一個小時纔講解完“經學大要”四個字，臺下學生聽眾卻早已：“預備了一套話來駁他。……徽師若單是講經還不要緊，一涉到現代的問題便無往而不見其千瘡百孔，而且許多也是極淺薄之見。”⁷¹又學生們在比較了胡適與區大典的演講後，便看出兩者的優劣；有的學生甚至早就不滿意於“經學”，以為那是騙人的東西；有的學生則以為區大典講來講去都是那一套。⁷²結果在許地山到任港大中文學院後，縱使勉強繼續聘請區大典在港大中國文史學系任教一年，但：

學生卻討厭了經學，只得改請他講授漢魏古詩，這原是過渡辦法。⁷³

陳君葆於是如下評斷區大典所講之經學，以及“拔萃書院”的中文教員而說道：

70 德富蘇峰強調以他自己為代表的江戶文久年間（1861—1863）以後出生的，包括北村透谷、三宅雪嶺等“明治青年”，是與福澤諭吉、板垣退助等江戶天保年間（1830—1843）的“天保老人”相對立的，而1842年出生的竹添光鴻正是“天保老人”，則1822年出生的根本通明，則是較天保（1830—1844）年間更早的文政年間（1818—1830）出生的老人了。參見德富蘇峰：《第十九世紀日本ノ青年及其教育》一文。本文轉引自色川大吉：《第二部 國家進路の摸索の時代・1 新日本の進路をもとめて—德富蘇峰の描いた未來像—》，載《明治精神史》（下）（東京：講談社，1992年），頁13。色川大吉並於該書《第二部 國家進路の摸索の時代・3 明治二十年代の思想・文化—西歐派と國粹派の構想—》一文中，以為蘇峰此區分不具效力，而自行將“明治青年”進而區分為1850年代出生的“明治青年第一代”，和1860年代出生的“明治青年第二代”，頁74—75。

71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1935年3月13日條，頁133。

72 同上。

73 同上，1936年9月24日條，頁249。

這類的八股先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真絕物之不如。課程原是死東西，要靠能幹的人纔能活用，所以要緊仍是教員。⁷⁴

如上所述，東京帝大與港大講堂上的“經學”課，百無聊賴之外，問題弊端叢生。不僅學生無心修習，教師授課方法更令人不敢苟同，絕非胡適所謂以歷史與科學之見地來研究或教授經史，更遑論要從事參考比較美日既成材料的研究。另外，港大中國文史學系的分科，與東京帝國大學設置以還，日本境內外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或文學部自明治三十七年(1904)以降，係由“哲學”、“史學”、“文學”三學科構成的體制，有著高度的雷同性。⁷⁵ 而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課程幾經改訂，日後課目上雖無“經學”，實際做法卻是把“經書”課程歸屬到“東洋哲學”(日後改爲“支那哲學”)課目下。例如後文所述胡適於昭和二年(1927)自英國抵達日本，匆忙中到東京帝國大學演講的這一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新學年講義題目中，服部宇之吉所教授的《周禮》，以及宇野哲人所教授的《周易》，都隸屬於“支那哲學”科目之下。⁷⁶ 又如昭和六年(1931)，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部支那學相關講義中，宇野哲人所教授的“《爾雅注疏》”，以及高田真治所教授的“《孟子研究》”，仍是歸屬於“支那哲學”科。⁷⁷ 而該年日本境內其他三所帝國大學文學部的講義題目中，京都帝國大學小島祐馬所教授的“《周易》序說”也是歸屬於“支那哲學史特殊講義”；東北帝國大學武內義雄則罕見地在“支那哲學講義”的課目下，教授了講題爲“經學入門”的課程。但國內另一所帝國大學——九州大學，與日本境外殖民地的京城帝國大學與臺北帝

74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1936年9月24日條，頁249—250。

75 明治三十九年(1906)九月，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先設置哲學科，明治四十年(1907)九月再設置史學科，文學科則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九月設置。詳參波護礪、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2011年第16期，頁87—110。繼而東北帝國大學於大正十一年(1922)，九州帝國大學於大正十三年(1924)分別設置文學部，亦皆分別設有“支那哲學”、“東洋史學”、“支那文學”三學科。

76 詳參斯文會：《東大文學部新學年講義題目》，《斯文》第9編第6號(1927年6月)，頁54—55。

77 詳參斯文會：《東京帝大文學部講義題目》，《斯文》第13編第5號(1931年5月)，頁68。

國大學，其文學部之講義中，“經學”或“經書”則完全自課目與講題中退場。⁷⁸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相較於中國大學院校乃是將“群經諸子”編入“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一)(二)”課目中，諸子思想纔編排進“哲學系”中；日本帝國大學則將經、子皆編排進“支那/中國哲學”中，中日雖然皆於科目或課目中取消了“經學”一詞，但仍講授“經學”、“經書”課程，而且從課名看來，日本多重“專經研究”；較少通論課程。又 1910 年代以後設置的帝國大學，無論是在日本境內於 1910 年設置的九州帝國大學，或是境外殖民地於 1924 年設置的京城帝國大學，以及 1928 年設置的臺北帝國大學，其文學部支那學領域的課程，進入 1930 年代，“經學”、“經書”課程一度完全消失。⁷⁹ 直到進入 1940 年代，神田喜一郎纔於昭和十六年(1941)、十七年(1942)連續兩年，於臺北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文學講讀及演習”課中教授《尚書正義》。

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許地山於 1935 年 9 月至港大擔任中國學院主任之前，早於 1933 年前往臺北帝國大學進行學術訪問，與當時任教臺北帝國大學的神田喜一郎交流，而此時許地山的世兄吳守禮已從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畢業，由於苦無教職機會，留校擔任神田喜一郎教授之“副手”(非編制名額內的助教)，⁸⁰故恰可擔任許地山與神田喜一郎學術交流時的翻譯。筆者不禁想問：許地山改革港大中文系的分科做法，乃至其將“經學”、“經書”課程徹底撤除的作為，為何與 1930 年代以還，日本在 1910 年代以後設置的，無論是境內或境外的帝國大學文學部課目中，“經學”、“經書”課程一度完全消失的情形如出一轍？此事意味著什麼？1930 年代初期，到日本殖民地臺灣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的許地山，其難道不會透過此次學術訪問機緣，獲得某種改革中文教育的啓迪？否則，其日後的港大中文學院改革作為，為何與日本當時的帝國大學文

78 詳參斯文會：《京都·東北·九州·京城·臺北各帝大講義題目》，《斯文》第 13 編第 6 號(1931 年 6 月)，頁 53—55。

79 京城帝國大學文學部課目，詳參朝鮮總督府內務部學務局編：《朝鮮教育要覽》第 1、2、3 卷，收入渡部學、阿部洋編：《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朝鮮篇》(東京：龍溪書社，1987 年)。臺北帝國大學文學部課目表，詳參臺北帝國大學編：《臺北帝國大學一覽》(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28—1944 年)。

80 詳參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收入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臺灣大學，2002 年)，頁 16。

學部做法,有著如此高度的相似度?抑或此種雷同只是時代潮流發展中的不約而同?

而舊式文人所講授“經書”、“經學”,乃至中國“史”之課程,既不受學生青睞,更飽受學生批評,故東京帝國大學“古典講習科”即使短暫設置並重新納入經學課目,卻明定其教學宗旨乃以“近代的學問、教育”為其教學目標。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所懷疑其價值的清朝考證學,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野成齋,卻以之來指導學生進行“實證的研究”。那麼,胡適所謂日本採借西方為學法的科學性“古典”研究,指的又是什麼呢?筆者以為其所指乃是:京都大學結合江戶考證學、清朝考證學與歐洲古典學的,三位一體的“支那學”研究。此點我們可由胡適與日本的交遊關係來考察。

而關於胡適與日本學界的關係,以下且舉幾件代表事件來進行說明。首先,日本學界最早介紹胡適學問的,當推京都大學的新銳支那學者青木正兒。青木正兒於大正九年(1920)九月、十月、十一月,於京都大學“支那學會”雜誌《支那學》創刊號開始,連續三號連載《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いる文學革命》。這是胡適於1917年元旦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3年後的事。青木盛讚這是26歲的留美新銳學生的堂堂文學革命宣言。⁸¹1923年1月,胡適自北京大學教務長一職卸任,胡適為紀念《申報》創刊50週年所寫成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一書,同年2月由當時旅居北京,被創辦《文字同盟》之漢學研究月刊的日本記者橋川時雄,翻譯為日文版的《輓近の支那文學》。⁸²1925年,胡適《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由楊祥蔭、內田繁隆共同翻譯,該年9月由東京巖堂書店出版。1927年,胡適《胡適の支那哲學論》,由井出季和太翻譯,該年四月由位在滿洲營口的大阪屋號書店出版。而由日本近現代作家武田泰淳的年譜記載道:1928年,武田泰淳16歲時就已經反覆熟讀魯迅、胡適之

81 詳見青木正兒:《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いる文學革命》,《支那學》,1920年第1卷第1號,頁11。

82 今村與志雄:《橋川時雄著譯年表》,《文字同盟》,1991年第3卷,頁644—666。1923年的條目中記載道:“2月,胡適《輓近の支那文學》(原題《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翻譯)東華社 東京。”

著作,以及武田泰淳就讀東京帝國大學一年級時,是以胡適《白話文學史》作為上課教材看來,一般日本學界推測:武田泰淳最早發表在《中國文學》雜誌上的小說《E女士の柳》,其中的主人公乃是胡適。

而胡適也曾多次赴日,例如1926年7月至1927年5月,胡適遊歷英、法、美等國,1927年5月5日胡適自英國來到日本,倉促赴東京帝國大學演講,講題為“中國之更生運動”,回到中國後,翌年的1928年便創辦《新月》雜誌。此次日本行,胡適更透過“斯文會”人士,希望可以幫其複印一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元朝吳昌齡之《西遊雜劇》珍本。⁸³ 也是在1927年5月,胡適說他從美國回來,過日本奈良,曾在旅館見著港大創始校長愛里鸚爵士。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lvan Levi),瑞士《現改法國籍》的戴彌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堪稱盛會。⁸⁴ 又1933年10月,胡適過東京、橫濱,會見了鈴木大拙,並透過鈴木而知道日本有新發現的北宋本《六祖壇經》,待其回到北平後,不久即收到鈴木寄贈的京都崛川興聖寺所藏之《六祖壇經》影印本一部。⁸⁵ 另外,1936年7月14日,胡適從上海啓程赴美國,16日從神戶到東京,撰作《從神戶到東京,道中望富士山》詩,過東京時,將此詩初題贈當時駐日大使許世英。且此次過東京,胡適還曾與室伏高信晤談,後室伏高信將此次會談寫成《胡適再見記》。⁸⁶

其實,胡適自1935年至1936年,曾多次要求政府當局讓其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⁸⁷ 待1938年9月17日,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日本內閣倍感壓力,日本國內輿論發起所謂:日本政府應該派遣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纔能壓制胡適的能力。此三人分別是文學家鶴見祐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雄辯家松岡洋右。⁸⁸

83 詳參斯文會:《東大文學部新學年講義題目》,頁55。

84 胡適:《南遊雜憶》,頁200。

85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3,頁1212。

86 同上,頁1532—1533。

87 詳參胡質平:《胡適與韋蓮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128。

88 詳參張璋:《胡適當過四年駐美大使》,《環球時報》,2002年8月5日。

其實，清末以來隨著何如璋、黎庶昌等清國公使，以及王韜等清朝文人陸續訪日，到民國初年魯迅等留日學生更形增多，近代中日兩國文人於政治、學術交流，往來益為密切，而胡適堪稱是其代表之一。日本文化、學術的傳輸中國，在中文學界的表現即是大量日本漢學/支那學學術著作的譯介到中國。而胡適著作的反輸入，在當時堪稱特別。然據前文所述，胡適自身學問的形成，顯然在受美國影響的同時，其更有意識地關注日本教育界、學界的既有成果與動態發展。諸如上述對日本所藏珍本、宋本的蒐羅，乃至其關注到日本漢學之近代轉型過程中，其兩大特色就在：首先藉由研究東西文化交流史而淬鍊出“東洋史學”觀點，以及京都大學發展出結合中日考證學與歐洲古典學的，具備科學性的“支那學”研究方法。甚至其著作，當時中日學界亦有人懷疑其係以翻譯代創作，剽竊自日人著作。⁸⁹

凡此種種，無非再次說明胡適與日本關係之深，即使言其思想著作深受日本影響，亦不為過。而藉由本節的考察梳理，不也可以再次確認，無論是胡適還是許地山，彼等改革港大中文學院之計劃事業，背後顯然有著日本的影子。而港大中文教育改革結果，無論從其分科或是“經學”從科目、課目乃至內容完全退場一事，則堪稱是除了中國本地以外，東亞當時各帝國大學的共相。

四、結語：那些在可說和不可說之間的

本文立足於先行研究成果，進而從一個相對廣域的東亞視野而來考察1934年以還，始於胡適，歷經陳受頤、容肇祖，完成於許地山的港大中文系改革事業之緣起原委、發展經過、造成之結果及其可能意涵。全文主要討論兩大議題，一是將港大中文系之改革，視為中國新文化思潮、文學革命之一環，重新分析胡適主持計劃改革港大中文系這一事業的性質為何？二是將港大中文系改革之兩大結果，亦即區分中國文史學系為“哲學”、“史學”、“文學”、“普通文

89 長澤規矩也：《支那學不要書目略解》，收入《斯文》第13編第6號（1931年6月）就曾列舉當時剽竊自日人著作的中國學者專書，明言其無需購買。名列當中者，不僅有顧實的《中國文學史大綱》，長澤更說道：“一民國學者也說：胡氏剽竊日本人著作。”（頁37）

學”四部,以及“經學”自港大中文教育退場,置於東亞之近代新式大學課程如何編派舊學的發展脈絡中,以思考其間所展現出的共同樣態。

透過本文之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歷來研究多指出許地山因其留學英國與通曉英文背景,所以能獲得胡適青睞,進而獲得港大當局聘任。但筆者根據陳君葆日記記載,卻發現許地山在胡適推薦之前,應該有自投履歷在先,此次申請過程中,許地山在港大的同學莫應嵩協助無效,但另一位人士東木,亦即林棟卻也有意願聘請許地山,惟此次申請無疾而終。日後再獲胡適推薦時,雖有這位港大當局屬意信任的重量級貴人相助,但此事最後終能成功的背後,林棟的高明手腕,以及陳君葆的持平推薦,恐怕才是將許地山推進港大中文學院的,不可或缺的臨門一腳。

又先行研究也指出:胡適所以推薦許地山,恐怕還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在臺成長經歷。本文則指出,胡適對港大最大的肯定,就在當年港大校長愛里鸚爵士推薦了鋼和泰給北京大學,從此留在北大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胡適認為這是港大與中國內地的學術交流美事。胡適或恐就是在許地山身上懷想起當年的愛里鸚,今胡適將研究宗教史學、印度學、梵文的許地山推薦給港大,就如當年愛里鸚將鋼和泰推薦給北大,投桃報李,都是一樁學術交流美事。只是胡適這次是反向的中國學術人才派任港大,希望其能在港大落地、育才、生根。

而關於原本遙遙無期的港大中文學院之改革“停滯”現狀,所以能在胡適參與後快速達成目的,一般多未論及。本文以為港大中文教育之改革,其實並非只是一個大學內部單純的“課程”架構問題。我們應該將之納入民國初年以來胡適所從事的“文學革命”之一環來加以認識。此處的“文學”泛指“學問整體”的更新,就如同胡適所謂的“哲學”,指的是“社會與政治的革新”。故其主持計劃的改革,乃是一種強調“速度”與“經濟性”的“有意打鬼”行爲,涉及的層面擴及歷史、學術、思想、社會、政治,以致於“讀經”派者被剷除一空,舊學“經學”被完全撤除。但這個結果真的就只是為了達成英國人心目中的“漢學”模式嗎?若是,則其應該維持“經籍”仍保留在“中國哲學”的科目下纔是,今令“經學”完全退場,不僅是在英國人意想之外,也在中國內地“中文教學變動潮

流”之外。筆者因此判斷胡適、許地山的港大中文學院改革發想源頭，恐在“域外”。

關於此一意外發展結果，既然許地山未明說，則我們只好從同是參與新文化運動，同時又是港大中文學院改革計劃之幕後推手的胡適來推測思考。結果從胡適的反對“讀經”理由，以及其批判清朝“古學”研究之三大缺點看來，無論是讀經能否解決“做人”問題，抑或古代經典“研究方法”的不合時宜、不具科學性，“經學”都是其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而要解決“經學”與“經學研究”所衍生的弊端，借鑑西方為學方法乃是必然趨勢。惟日本在取法西方學者研究古學上已多有經驗與成果，故可借鑑日本人之成果、材料。在胡適看來，此係為求古學研究之“新法門”的方便法門。而本文以為胡適此種向日本學術取法借鏡的思維，基本上也一定程度反映在其對大學中文系分科的想法上。

事實上，胡適所謂大學/中文系須要“從事本國高等文學”的主張，恰與日本當局在開辦東京大學文學部時，所以要加設“和漢文學科”的理由在於所謂“感慨斯文殆墜於地”的考量一致。而胡適早在1932年時便感嘆：“五千年的中國，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此話背後就在將1912年設置的北京大學，與1897年東京大學改制為“東京帝國大學”，以及同樣在該年設置的“京都帝國大學”對舉比較。由此看來，胡適始終意識到日本大學教育超前於中國，同時也關注日本學界的學術研究發展。本文因此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例，而來觀察日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分科編設發展情形，試圖藉此爬梳港大中文學院之改革結果與日本帝國大學之間的關聯性。

日本帝國大學文學部的課程架構、課目編派發展，一言以蔽之，就在“哲學”、“史學”、“文學”三科編制的常態化，與科目、課目的“去經學化”。且相較於中國大學院校乃是將“群經諸子”編入“中國文學專書選讀(一)(二)”課目中，諸子思想纔編排進“哲學系”中；日本帝國大學則將經、子皆編排進“支那/中國哲學”中。換言之，中日兩國雖然皆於科目或課目中取消了“經學”一詞，但事實上仍講授“經學”、“經書”課程。但是，1930年代以還，日本在1910年代以後設置的，無論是境內或境外的帝國大學文學部課目中，“經學”、“經書”課程一度完全消失。而令人驚訝的偶然是：許地山在港大改革中文學院的做法，

竟然與此情形如出一轍？而有鑒於 1933 年許地山曾到臺北帝國大學從事學術交流訪問，筆者因此合理推測 1930 年代初期，到日本殖民地臺灣進行學術交流訪問的許地山，其難道不會透過此次學術訪問機緣，獲得某種思考改革中文教育時的做法啓迪？從而使得港大中文教育改革結果，無論從其分科或是“經學”從科目、課目乃至內容完全退場一事，呈現出與當時東亞各地帝國大學文學部面貌一致的共相。

如上所述，藉由本文之考察我們得以合理推測：港大中國文史學系“中國經學”課程的退場，確實存在著隱而不宣的“日本因素”。盧瑋鑾曾提醒我們，要思考許地山改革港大中文系一事，必須注意：

多少成分是港大當局的意願，多少成分是許地山的理想，是值得後人考慮的。⁹⁰

筆者則以為，在近代文化轉型的巨大變動中，設若試圖思考由朝鮮半島、臺灣、香港三個地理點所劃出的此道圓弧線上的任何問題，我們最須努力的，恐怕就在具備一種東亞的視野，以尋找並拼湊出那些在可說和不可說之間的失落拼圖，而“日本”則常是此道弧線區的不可說。

（作者：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90 盧瑋鑾：《許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頁 116。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

左玉河：《中國近代學術體制之創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編：《許地山先生追悼會特刊》。香港：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會籌備會，1941年。

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胡適：《先秦名學史》，載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胡適：《南遊雜憶》，載《胡適作品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

胡曉明編：《讀經：啓蒙還是蒙昧？——來自民間的聲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單周堯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7年。

臺北帝國大學編：《臺北帝國大學一覽》。臺北：臺北帝國大學，1928—1944年。

鄧又同：《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抄》。香港：學海書樓，1991年。

盧瑋鑾：《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

賴際熙：《荔垞文存》，收入林慶彰主編：《民國文集叢刊》。臺中：文聽閣圖書，2008年。

錢穆：《師友雜憶》，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

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

教育部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局，1940年。

(二) 論文

吳守禮：《我與臺灣語研究》，載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臺灣大學，2002年，頁

9—30。

李景康：《香港大學講師林棟君墓誌銘》，收入李鳳坡先生詩文集籌印委員會編：《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李鳳坡先生詩文集籌印委員會，1963年。

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的變革》，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597—611。

車行健：《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131—159。

周俟松：《許地山年表》，載劉紹銘編：《許地山作品選》。香港：三聯書店，2007年，頁217。

金培懿：《近代日本〈論語〉研究之轉折——安井小太郎〈論語講義〉析論》，《國文學報》，2006年第40期，頁19—73。

金培懿：《復原與發明——竹添光鴻〈論語會箋〉之注經途徑兼論其於日本漢學發展史上之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7年第30期，頁307—353。

胡從經：《新文化運動在香港迴響與勃興的實錄——讀陳君葆日記》，載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全集》，卷7。香港：商務書局，2004年，頁603—611。

胡適：《非留學篇》，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教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23。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載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頁3—6。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說明》，載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

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2011年第16期，頁87—110。

梁皇儀：《晚清迄民國前期讀經問題之探討》，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頁69—92。

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1912至1941年間的發展》，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555—595。

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李景康與〈儒家學說提要〉的啓示》，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495—518。

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兩種〈大學中文哲學課本〉的啓示》，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521—553。

黃偉豪：《香港南來學者的經學思想——以陳湛銓及其交遊圈為中心》，載林慶彰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冊5。臺北：萬卷樓，2014年，頁465—611。

魯迅：《略談香港》，《語絲》，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收入《語絲 第一二一期至第一五六期(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頁67—72。

(三) 報紙

張瑋：《胡適當過四年駐美大使》，《環球時報》，2002年8月5日。

二、日文

(一) 專書

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東京：講談社，1976年。

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下)。東京：講談社，1992年。

町田三郎：《明治の漢學者たち》。東京：研文出版，1998年。

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上冊。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932年。

波護礪、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

朝鮮總督府內務部學務局編：《朝鮮教育要覽》，卷1—3，收入渡部學、阿部洋編：《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朝鮮篇》。東京：龍溪書社，1987年。

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

笹川種郎：《明治還魂紙》，收入臼井吉見編：《明治文學全集99·明治文學回顧錄集(二)》。東京：筑摩書房，1980年。

(二) 論文

今村與志雄：《橋川時雄著譯年表》，《文字同盟》，1991年第3卷，頁644—666。

岡本黃石等著，神田喜一郎編：《略歷》，載《明治文學全集62·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1983年。

長澤規矩也：《支那學不要書目略解》，《斯文》，第13編第6號(1931年6月)，頁33—37。

青木正兒：《胡適を中心に渦っている文學革命》，《支那學》，第1卷第1號(1920年9月)，頁11—26。

斯文會：《京都·東北·九州·京城·臺北各帝大講義題目》，《斯文》第13編第6號(1931年6月)，頁53—55。

斯文會：《東大文學部新學年講義題目》，《斯文》第9編第6號(1927年6月)，頁54—55。

斯文會：《東京帝大文學部講義題目》，《斯文》第13編第5號(1931年5月)，頁68。

The Exit of Chinese Classics Course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sider from East Asia

Chin Pei-y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East Asian horizon to explore the origin, process, result and meaning of the reformation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 which was begun by Hu Shih from 1934, developed by Chen Shou-yi, Yung Zhao-zu, and finished by Xu Di-shan. Firstly, I see the reformation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HKU as a part of “new culture trend” and the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reanalyze the properties of Hu Shih’s plan for the reformation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HKU. Secondly, I put the result of the the reformation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HKU, that to separ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s four parts: philosoph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ommon literature, and to let Chinese Classics course exited from the Chinese education in HKU,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urse in modern East Asian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 think that the reformation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HKU was not a matter about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but a part of the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in China which related with Hu Shih. And the exit of Chinese Classics Course in HKU was not only unexpected for British but also out of the change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hina. Through this study, I think that the origin of this reformation was in foreign. And there was invisible factors about Japan related with the exit of Chinese Classics Course in HKU.

Keyword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nfucian Classics, Hu Shih, Xu Di-shan, Japanese Sinology,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